

柳林, 宋广文, 肖露子, 等. 不同犯罪类型受害者报警行为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学, 2018, 38(12): 1998-2005. [Liu Lin, Song Guangwen, Xiao Luzi et al.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 Factors of Victims' Crime Reporting Behavior of Different Victimizat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12): 1998-2005.] doi: 10.13249/j.cnki.sgs.2018.12.007

不同犯罪类型受害者报警行为特点 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柳林^{1,2}, 宋广文^{3,4}, 肖露子^{3,4}, 周素红^{3,4}, 宋广钦^{3,4}, 龙冬平^{3,4}

(1.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公共安全地理信息分析中心, 广东 广州 510006; 2. 辛辛那提大学地理系, 辛辛那提 OH45221-0131, 美国; 3.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综合地理信息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275; 4. 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采用问卷调查数据, 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框架, 对广州地区扒窃、诈骗、入室盗窃、暴力侵害四大犯罪类型受害者的报警行为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 扒窃和诈骗的发生率较高, 但报警率较低; 入室盗窃和暴力侵害的发生率较低, 但报警率较高。逻辑回归结果表明, 损失的财产价值是影响扒窃、诈骗、入室盗窃、暴力侵害受害者报警行为的共同因素, 损失越大, 报警的可能性越大。此外, 户口状态对扒窃报警行为有影响; 入室盗窃和暴力侵害的报警行为还受个人客观属性和主观感知的影响。表明西方的理性选择理论框架适用于中国的报警率研究, 但在选择具体的衡量指标时应更慎重; 在对用公安部门的数据进行犯罪空间分析时, 应注意报警率的影响。

关键词: 报警行为; 报警率; 受害者; 扒窃; 诈骗; 入室盗窃; 暴力侵害

中图分类号: K9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8)12-1998-08

目前, 国内关于犯罪地理的研究正在兴起, 相关成果能为犯罪空间预防、警务决策提供参考依据^[1,2]。研究中的犯罪数据主要由公安部门提供, 少部分来自于对媒体等公开渠道的信息的收集^[3,4]。相比之下, 公安部门的数据记录了人们受到侵害时向公安报警的情况, 数据覆盖更全面, 相应的研究成果也更多^[5-7]。但已有的研究表明, 并非所有的人受到侵害时都会选择报警, 公安部门数据所反映的犯罪情况可能与实际情况仍存在一定的差异^[8], 而这种差异性可能会对犯罪地理的部分研究结论产生影响。

例如, 犯罪空间格局分析一直是犯罪地理研究的重要方面, 犯罪现象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性^[9-11]。徐冲基于公安局提供的数据, 对DP半岛街头抢劫

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主干道、通达性高的节点或土地利用混合度高的区域是街头抢劫的热点, 部分犯罪热点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12-14]。但基于公安数据所识别的犯罪热点与冷点可能是由于不同区域人们受到侵害时选择向公安部门报警的概率(简称“报警率”)的差异所导致。因此, 研究人们受到不同类型犯罪侵害时报警行为的特点及形成原因对犯罪地理的研究与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内司法和社会学领域对这个问题有了初步探讨, 分析认为公安所统计的犯罪情况比实际情况低的现象较普遍^[15-17]。王大为对联合国有关受害问题的国际调查数据分析后发现, 中国扒窃、性侵犯、自行车盗窃、袭击等犯罪的报警率均没有达

收稿日期: 2018-01-18; **修订日期:** 2018-03-26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8YFB0505500, 2018YFB05055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531178)、广州市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201804020016)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研究团队项目(2014A030312010)资助。[Foundation: National Key R&D Program of China (2018YFB0505500, 2018YFB0505503), Key Program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531178), Key Proje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 of Guangzhou City, China (201804020016), Research Team Program of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2014A030312010).]

作者简介: 柳林(1965-), 男, 湖南湘潭人, 博士, 教授, 博导, 主要从事犯罪空间模拟、多智能体模拟、GIS应用等研究。E-mail: liulin2@mail.sysu.edu.cn

通讯作者: 肖露子。E-mail: xiaoluzi@mail2.sysu.edu.cn

到50%，“不值得报警”“报警作用不大”是其重要原因^[18]。但总体上，国内关于报警行为或报警率的研究较少，且多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鲜有涉及定量的机理分析或理论探讨。

西方文献对报警率的研究起步较早^[19]，理性选择理论是分析报警行为的重要理论，付出、风险和收益是影响报警行为的3个重要维度，当付出较小，风险较小，收益较大时，受害者将倾向于选择报警，具体的影响因素可总结为个人、社区、犯罪情况三大层面^[20,21]。个人层面，性别、年龄、学历是文献考虑的重点因素^[22]；社区层面主要考虑社区的社会环境，例如社区融合度、邻里守望效应等^[8,23]；犯罪层面则主要探讨财产损失、受威胁程度（是否携带武器等）、与犯罪者的关系三大方面，财产损失越大，报警的可能性越大^[24,25]；不认识犯罪者的人比认识犯罪者的人更偏向于选择报警^[20]。此外，对警察态度的感知对受害者的报警行为也有重要的影响^[24,26]。

不同犯罪类型的报警率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差异^[27]。整体上，暴力侵害的报警率比财产犯罪的高^[25]。Baumer在研究美国人报警行为的时间变化时发现，暴力和财产犯罪的报警率均在逐年增加，致命暴力侵害的报警率与犯罪者是否带武器、受伤程度、性别、种族、婚姻状态、年龄等均有关系，男性、白人、已婚、受伤程度越重、年龄越大越倾向于报警，而犯罪者携带武器会抑制受害者的报警行为，已婚、白人、财产损失越大、家庭收入越高的群体财产犯罪的报警率较高^[27]；Zhang在研究中国天津市民报警率的时候发现，抢劫或殴打、扒窃、入室盗窃三大类型的侵犯的受害者的报警行为主要受损失价值的影响，受个人特征、家庭因素或社区因素的影响并不大^[20]。

虽然已有的研究较成熟，但仍存在一些不足。①对个人主观因素的考虑不足。不同的人对付出、风险、收益的判断及对受侵害后的态度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自认为社会地位低的人或反抗意识弱的人报警的概率可能较低。但已有的研究较少考虑到对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②缺乏对诈骗受害报警行为的研究。已有的研究主要以扒窃、入室盗窃和暴力侵害的报警行为为主，鲜有涉及到诈骗类型。③对中国情况的研究较少。国内外关于中国报警率的研究均较少，虽然西方的理论体系相对成熟，但由于中西方的社会环境存在

差异，西方的结论能否应用于中国仍需进一步的探讨。因此，本研究以理性选择理论为研究框架，分析扒窃、诈骗、入室盗窃和暴力侵害四大犯罪类型受害者的报警行为的特点，并进一步将个人的主观因素纳入控制变量，建立逻辑回归模型对广州居民报警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讨论报警率对犯罪空间分布的潜在影响。

本研究的创新点和对文献的主要贡献体现在：①优化分析框架，增加考虑了个人主观感知的影响，对城市整体安全的评价、阶层感知、反抗意识进行了细化衡量，并发现它们对入室盗窃和暴力侵害的报警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弥补了文献的不足；②本研究针对诈骗受害者的报警行为进行了分析，发现损失价值是其唯一影响因素。③本研究选择了户口状态、广州话水平等具有区域性特征的变量对报警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进一步丰富了研究中国报警率的文献体系。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

为了探究居民受到不同类型侵害时报警行为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团队于2016年1~4月（除去春节假期）在广州组织开展了犯罪受害调查。由于广州地域较辽阔，调查无法做到社区的全覆盖，本研究参考周素红等在调查居民日常行为时的抽样方法^[28]，利用社会区聚类分析、空间抽样的方法确定调研社区，采用社区随机拦截的方法，并对样本按特定要求进行约束，使样本能反映整个广州市的情况。社区选取规则和调查基本情况如下所示。

调查社区选取：本研究主要通过六普数据提取主成分并进行聚类，识别社区的类型及特点，在此基础上，考虑空间均匀，在每一类社区中挑选典型的社区进行调查。主成分分析要求分析的数据是正定矩阵，因此，变量间相关性太强会导致非正定矩阵出现，经过反复多轮筛选，最终选择10大类共40个指标进行正交旋转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的KMO(Kaiser-Meyer-Olkin)值为0.726（大于0.7），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125 421.746，在0.001的水平下显著，分析结果可接受；结合解释的总方差和碎石图，按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共提取9个主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78.8%。在此基础上，以9个主因子为变量进行聚类分析，根据

碎石图的特点,最后聚出9类社区(图1),分别是:中产阶级社区、高校社区、非老龄化农村社区、旧城老龄化社区、老龄化农村社区、外来人口社区、廉租房社区、经适房社区、高级住宅区。

抽样方法:考虑社区的类型、空间分布、各类社会区的总人口比例,经过实地考察,选取了各大类型社区的代表共计74个社区进行问卷调研。另外,根据社区的特点进行样本约束,例如外来人口社区,要求调查的样本以外来人口为主。此外,在调查时注意考虑年龄、户籍结构,使调查的样本所反应的群体结构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相近。本研究调查对象不包括18岁以下的群体或在校学生。

调查基本信息:获得首轮调查结果后,对问卷进行有效性检查,剔除不合格的问卷并进行补充调研,最后共收集有效问卷1568份。在调查的样本中,“您有没有经历过扒窃/诈骗/入室盗窃/暴力”,回答“有”的受访者将进一步回答关于报警行为的有关问题。参考文献的衡量方法^[20],针对报警行为询问“您最近经历的一次扒窃/诈骗/入室盗窃/暴力有没有报警?”(有=1,没有=0),以此作为本研究模型的因变量。有扒窃、诈骗、入室盗窃、暴力侵害的经历的分析样本分别为316、178、111、50。

自变量的选取全来自于问卷,包括个人客观属性(年龄、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就业状态、月收入、户口、广州话水平)、主观感知(阶层感知、安全评价、见警率、警察满意度、反抗意识)、犯罪情境三大层面。犯罪情境设的变量因不同犯罪类型而存在差异(损失价值与是否认识犯罪者为共有变量),针对入室盗窃设置了“犯罪者是否在本社区”与“家具损坏情况”两大变量,针对暴力侵害设了“受伤程度”和“犯罪者是否携带武器”两大变量。各变量的具体描述见表1。

1.2 方法

本文采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居民受到不同犯罪类型(扒窃、诈骗、入室盗窃、暴力侵害)的侵害后是否进行报警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构为:

$$\ln\left(\frac{p_i}{1-p_i}\right) = \alpha + \sum_{k=1}^k \beta_k X_{ki}$$

式中: p_i 为被侵害后进行报警的概率; X_{ki} 是影响报警率的因素, i 是样本量, k 为变量的总数, α 是与自变量无关的常数项, β_k 为偏回归系数。比值比的对数 $\ln[p/(1-p)]$ 可以用 X 和 β 的线性形式来表示。比值比 $[\exp(B)]$ 的表达式为 $p/(1-p)=\exp(\beta_i X_i)$, e^β 衡量了解释变量 X_i 的一单位变化对比值比的乘数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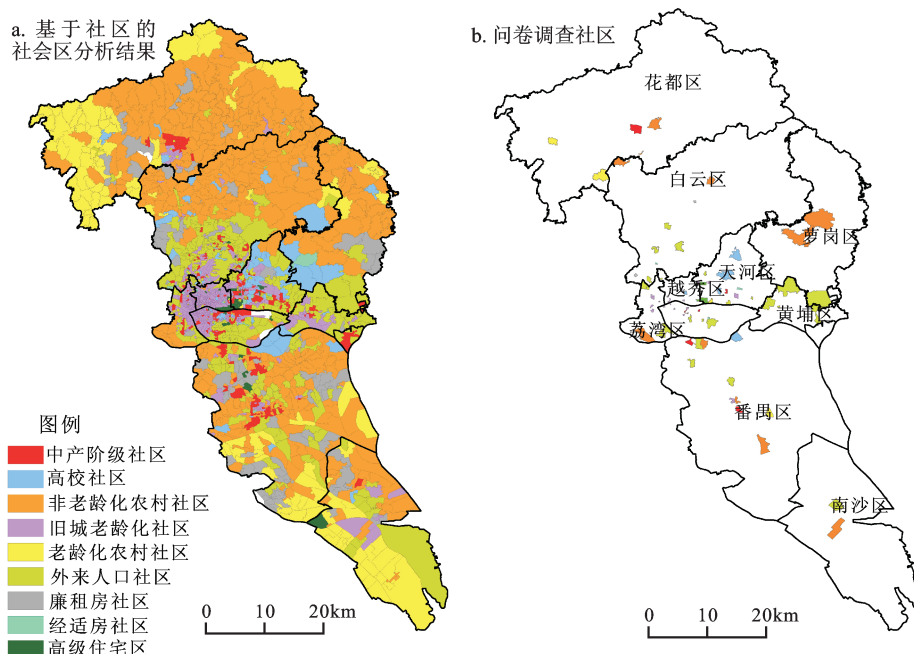


图1 广州社区分析结果及问卷调查社区分布

Fig.1 The spatial pattern of social area and the chosen communities for questionnaire in Guangzhou

表1 广州社区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amples in Guangzhou

变量	描述	值	总样本 (1568)	犯罪类型(起)			
				扒窃 (318)	诈骗 (179)	入室盗窃 (111)	暴力侵害 (50)
是否报警(%)	最近一次被侵害,您有没有报警?	否(0)	—	0.660	0.793	0.514	0.540
		是(1)	—	0.340	0.207	0.486	0.460
年龄	您的岁数	平均值	38.030	35.723	33.989	37.766	38.300
		标准差	14.016	12.318	12.817	13.087	12.738
性别(%)	您的性别	男(0)	0.533	0.525	0.592	0.532	0.700
		女(1)	0.467	0.475	0.408	0.468	0.300
婚姻状态(%)	未婚包括单身、离异、丧偶	未婚(0)	0.313	0.333	0.402	0.252	0.380
		已婚(1)	0.686	0.667	0.598	0.748	0.620
教育水平	未受过教育(1)→研究生或以上(8)	平均值	4.260	4.506	4.380	4.045	3.800
		标准差	1.608	1.622	1.558	1.551	1.604
是否失业(%)	您的就业状况? 失业(1);在业(0)	否(0)	0.952	0.947	0.944	0.928	0.960
		是(1)	0.048	0.054	0.056	0.072	0.040
月收入(元)	1 000元以下(1)→1 000元以上(7)	平均值	3.580	3.744	3.657	3.455	2.900
		标准差	1.424	1.499	1.394	1.482	1.529
是否非外地农业户口(%)	是否本地户口	否(0)	0.562	0.598	0.559	0.660	0.560
		是(1)	0.438	0.402	0.441	0.340	0.440
广州话水平	一点都不会(1)→很流利(5)	平均值	3.690	3.711	3.525	3.658	3.260
		标准差	1.412	1.389	1.395	1.528	1.509
阶层感知	下层(1)→上层(5)	平均值	2.180	2.245	2.218	2.054	1.960
		标准差	0.920	0.931	0.938	0.952	0.968
安全感知	很不安全(1)→很安全(5)	平均值	3.530	3.387	3.369	3.252	3.080
		标准差	0.764	0.761	0.770	0.756	0.966
见警率	几乎看不到(1)→总是看到(5)	平均值	3.150	3.079	3.117	3.045	2.840
		标准差	0.835	0.808	0.850	0.835	0.866
警察满意度	很不满意(1)→很满意(5)	平均值	3.400	3.173	3.246	3.045	2.980
		标准差	0.779	0.785	0.858	0.908	1.020
反抗意识	当自己遭受侵犯时,会当即反抗,赞同吗? 很不赞同(1)→非常赞同(5)	平均值	3.560	3.566	3.553	3.495	3.760
		标准差	0.990	0.920	1.066	1.017	1.117

注:“是否报警”变量的“—”表示在总样本中该变量数据不存在,“是否报警”针对的是有受害经历的调查对象,而非整体;有=1;没有=0。

应,即当其它变量不变时, X_i 增加一个单位,将引起发生比扩大/缩小 $\exp(\beta_i)$ 倍。逻辑回归采用的是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通过计算模型似然比的卡方的观察值和概率 p 值,如果概率 p 值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则应拒绝零假设,认为目前方程中的所有回归系数不同时为零,模型合理。模型的效果常用 $-2 \text{ Log likelihood}$ 、 $\text{Pseudo } R^2$ 、 $\text{Percentage Correct}$ 作为标准进行比较,前者值越小,模型拟合度越高;后两者值越大,模型拟合效果越好。

2 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

2.1 基本情况

在各类案件中,扒窃的发生率最高,有20.3%

的受访者有随身财物被盗的经历。诈骗次之(11.4%),入室盗窃、暴力侵害相对较低,分别为7.1%及3.2%;扒窃、诈骗、入室盗窃、暴力侵害的受害报警率分别为34.0%、20.7%、48.6%和46.0%。各大类型犯罪受害者的年龄接近,诈骗受害者的平均年龄最低,为34岁。

在四大类型犯罪中,均是男性受害者比例偏高,尤其是在暴力侵害者,比例高达70.0%,而总样本的男性比例仅为0.533。受害者中,入室盗窃的已婚比例高达74.8%(总样本中已婚比例为68.6%)。教育水平方面,暴力和入室盗窃受害者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3.800、4.045),而被扒窃和被骗的教育水平平均值相对较高(4.506、4.380);受害

群体样本中失业的比例较低,最高仅为7.2%。需要注意的是,暴力侵害受害者的广州话水平、阶层感知、安全感知、见警率、警察满意度等各项指标的平均值均为最低,但他们的反抗意识平均值最高,其它三大类犯罪的各项指标差异不大(表1)。

2.2 受害者不报警的原因调查

在问卷中,针对受侵害以后选择不报警的人员进行了原因调查,此定性分析可为下文的定量分析提供参考。由表2可知,找警察的作用有限和损失较小是受害者选择不报警的主要原因,与文献的结论一致^[18]。其中,损失较小是扒窃和诈骗受害者的重要考虑因素。对于入室盗窃而言,认为找警察作用有限、损失较小的人数较接近;而暴力受害者中,因觉得找警察作用有限而不报警的人数最多。

表2 受到侵害后不报警原因的定性分析

Table 2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failure to report after victimization

原因	暴力	扒窃	被骗	入室盗窃
担心犯罪者报复	2	7	5	1
找警察作用有限	10	67	45	27
损失较小	6	113	69	24
其它	9	24	23	6
样本总量(没有报警)	27	211	142	58

3 报警率影响因素的逻辑回归分析

扒窃、诈骗、入室盗窃、暴力侵害受害者报警行为原因分析模型如表3所示。四大模型均在0.001或0.01的水平下显著,模型成立。对比-2 Log likelihood、Pseudo R^2 、Percentage Correct三大指标发现,模型对暴力侵害的分析效果最好,入室盗窃次之,诈骗和扒窃的相对较差。

1) 扒窃。扒窃受害者的报警行为仅受户口和损失价值的影响。外地人员的报警率相对较低,本地人口扒窃报警的发生比是外地人口的2.654倍。外地人口的社会支持较弱,报警所需付出的成本相对高,因此与比本地人相比,其不倾向于报警。被盗窃财物损失价值越大,受害者报警的可能性就越大,损失价值增加一个单位,报警发生比将扩大2.008倍。追回财物是报警的主要预期之一,损失价值越大,报警挽回的损失或预期收益越大,对受害者有正向激励作用,因此财产损失的大小对扒窃报警行为有较大的影响。主观感知对扒窃报警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

2) 诈骗。诈骗受害的报警行为影响因素较单一,仅有损失财物的价值对报警率有显著的影响,损失价值每增加一个单位,报警发生比将扩大2.018倍。个人客观属性及主观感知均对诈骗受害者的报警行为没有影响,报警的预期收益是其是否报警的决定性因素。

3) 入室盗窃。入室盗窃受害者的报警行为受个人主观客观属性、主观感知、犯罪情境的共同作用。受教育程度越高,报警的可能性越大,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报警发生比扩大1.652倍,这可能是由于受教育高的往往风险意识更强,希望通报警降低二次伤害的可能性及追回损失。

在主观感知方面,越觉得广州安全的人员,发生入室盗窃后报警的可能性越低,每增加一个单位,报警发生比缩小41.2%,安全评价高的人员倾向认为这仅是偶发事件,不会有进一步的被盗危险。在犯罪情境相关的变量方面,损失价值对入室盗窃报警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损失价值每增加一个单位,报警发生比扩大2.702倍。觉得犯罪者在本社区的可能性越大,报警的概率越低,可能性每增加一个单位,报警发生比缩小0.373倍,担心犯罪者的报复而付出较大的成本导致受害者不倾向于报警。

4) 暴力侵害。暴力侵害的受害者的报警发生比受月收入、阶层感知、反抗意识、损失价值的影响。月收入越高,越倾向于不报警,月收入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报警发生比缩小0.295倍;这可能是由于报警后需要配合警方调查的时间较长,时间成本对于收入高的人较重要。主观感知对暴力侵害的报警行为影响亦较大,觉得自己在广州所处的阶层越高,他在遭受暴力侵害后报警的概率就越大,阶层感知每增加一个单位,报警发生比将扩大7.957倍;阶层越高的人更懂得如何通过警方寻求支持维护自身利益。反抗意识越强,则报警的发生比越低;选择当即反抗往往意味着报警存在不确定性,需付出的成本可能较高,从而抑制受害者的报警行为。此外,暴力侵害所导致的损失价值越大受害者报警的可能性越高。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在广州市开展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对受到不同类型犯罪侵犯时居民报警的行为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结论:

1) 在四大类犯罪中,扒窃和诈骗的发生率较

表3 各类犯罪报警率的逻辑回归分析

Table 3 Logistic regression of different crime reporting rate

变量		扒窃		诈骗		入室盗窃		暴力侵害	
		<i>B</i>	exp (<i>β</i>)	<i>B</i>	exp (<i>β</i>)	<i>B</i>	exp (<i>β</i>)	<i>B</i>	exp (<i>β</i>)
个人客观属性	年龄	-0.002	0.998	-0.036	0.965	-0.003	0.997	0.048	1.049
	性别	-0.360	0.698	-0.333	0.717	-1.120	0.326	0.880	2.411
	婚姻	0.629	1.876	-0.121	0.886	-1.061	0.346	0.307	1.359
	受教育程度	0.040	1.041	0.041	1.042	0.502*	1.652	-0.010	0.990
	就业状态	1.210	3.353	-0.684	0.505	1.791	5.995	-	-
	月收入	0.018	1.018	0.095	1.100	-0.186	0.830	-1.221*	0.295
	户口	0.976**	2.654	0.459	1.582	0.828	2.289	1.619	5.048
	广州话	-0.210	0.811	0.014	1.014	-0.185	0.831	-0.381	0.683
主观感知	阶层感知	-0.039	0.962	-0.042	0.958	-0.181	0.834	2.074*	7.957
	安全评价	-0.242	0.785	-0.244	0.783	-0.886*	0.412	-0.119	0.888
	见警率	0.235	1.265	-0.031	0.970	0.791	2.206	-2.026	0.132
	警察满意度	0.233	1.262	0.438	1.550	-0.224	0.799	2.147	8.559
	反抗意识	-0.237	0.789	-0.108	0.898	0.011	1.011	-1.413*	0.243
犯罪情境	损失价值	0.697***	2.008	0.702***	2.018	0.994***	2.702	0.738*	2.092
	认识犯罪者	1.222	3.394	0.472	1.603	-0.418	0.658	-1.966	0.140
	犯罪者在本社区(入室盗窃)	-	-	-	-	-0.987*	0.373	-	-
	损坏情况(入室盗窃)	-	-	-	-	0.766	2.151	-	-
	受伤程度(暴力侵害)	-	-	-	-	-	-	1.031	2.804
	携带武器(暴力侵害)	-	-	-	-	-	-	0.550	1.733
	Constant	-2.915*	0.054	-2.980	0.051	0.932	2.540	-0.998	0.369
模型参数	LR <i>chi</i> ²	81.050***		38.090***		62.620***		32.980**	
	-2 Log likelihood	323.496		141.158		89.727		36.015	
	Pseudo <i>R</i> ²	0.200		0.213		0.411		0.478	
	Percentage Correct	76.3%		82.0%		84.6%		86.0%	
	样本量	316		178		110		50	
	自由度	15		15		17		16	

注:***为 $P<0.001$; **为 $P<0.01$; *为 $P<0.05$; “-”表示该模型中不含有该变量,该变量是某类犯罪特有的变量;B为回归系数,exp(β)为比值比。

高(分别为20.3%和11.4%),但报警率较低(34.0%,20.7%);入室盗窃和暴力侵害的发生率较低(分别为7.1%和3.2%),但报警率较高(分别为48.6%,46.0%)。

2)损失的财产价值是影响扒窃、诈骗、入室盗窃、暴力侵害受害者报警行为的共同因素,损失的价值越大,报警的可能性越大。其中,诈骗受害报警行为仅受财产损失价值的影响,而扒窃受害者的报警行为还受户口状态的影响。入室盗窃和暴力侵害的报警行为同时受个人客观属性、主观感知、犯罪情况三大方面因素的影响。受教育程度高、对广州的安全评价低的居民报警率较高;月收入高、反抗意识强的居民受到暴力侵害后报警的概率较低,而阶层感知高的群体报警率较高。受

害者是否选择报警与其对报警的成本、潜在风险和收益的衡量有关。

本研究表明理性选择的分析框架适用于分析中国的情况,研究结论与前人研究亦存在共性,重点体现在各类侵害的报警率均不超过50%^[18],财产犯罪的报警率比暴力侵害的低^[25],损失的财产价值是各大类型犯罪受害者是否报警的重要影响因素^[27];个人客观属性(或称社会经济属性)对报警行为存在影响^[22,24,25]。但结论同样存在差异,例如见警率、警察满意度对四大类型的报警率均无影响,是否选择报警主要受个人因素的影响。

此外,控制了主观感知和犯罪情境的影响后,外来人口遭遇扒窃后报警的概率比本地人口低,受教育程度低的居民入室盗窃报警的概率比受教

育程度高的居民低。换言之,外来人口密集的区域,公安部门接到的扒窃报警的数量比实际数量低(犯罪低报)的现象较明显;教育程度低的居民集中的区域,入室盗窃的低报现象较明显。可见,报警率对犯罪的空间分布存在潜在的影响,即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报警数据分析的犯罪空间分布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

总的来看,本研究是已有犯罪地理文献的有效补充,揭示了不同犯罪类型受害者报警行为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并能为利用公安数据进行犯罪研究时提供较好的参考,但受限于篇幅和数据,本文仍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处。例如,由于扒窃、诈骗、暴力侵害不一定发生在居住的社区,本研究并没有将社区情况纳入分析体系,但对于入室盗窃则不然,下一步将结合社区的情况,研究社区环境对入室盗窃报警的影响机制;受数据限制,无法有效判断暴力侵害报警率的空间分异;受调研成本的数据,调查数据不能覆盖所有的社区,无法直接反映报警率的空间分异。此外,还可结合公安部门的犯罪数据具体评估报警率对犯罪空间分布的影响,进一步深化报警率的研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王发曾. 城市犯罪空间盲区的综合治理研究[J]. 地理研究, 2010, 29(1): 57-67. [Wang Fazeng. Study on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spatial blind areas in urban crim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0, 29(1): 57-67.]
- [2] 王发曾. 我国城市犯罪空间防控研究二十年[J]. 人文地理, 2010, 25(4): 25-30. [Wang Fazeng. A review of urban spatial anti-crime study in China from 1980 to 2000. *Human Geography*, 2010, 25(4): 25-30.]
- [3] 毛媛媛,丁家骏. 抢劫与抢夺犯罪行为时空分布特征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J]. 人文地理, 2014, 29(1): 49-54. [Mao Yuanyuan, Ding Jiajun. Study on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robbery and snatch: A case study of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Human Geography*, 2014, 29(1): 49-54.]
- [4] 毛媛媛,戴慎志. 犯罪空间分布与环境特征——以上海市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06(3): 85-93. [Mao Yuanyuan, Dai Shen-zhi. Research on spatial and environmental characters of crimes: Case study of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6(3): 85-93.]
- [5] 冯健,黄琳珊,董颖,等. 城市犯罪时空特征与机制——以北京城八区财产类犯罪为例[J]. 地理学报, 2012, 67(12): 1645-1656. [Feng Jian, Huang Linshan, Dong Ying et al. Research on the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urban crime: A case study of property crime in Beiji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12): 1645-1656.]
- [6] 刘大千,宋伟,修春亮. 长春市“两抢两盗”犯罪的空间分析[J]. 地理科学, 2014, 34(11): 1344-1352. [Liu Daqian, Song Wei, Xiu Chunliang. Spatial analysis on robbery, forcible seizure, vehicle theft and burglary in Changchu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11): 1344-1352.]
- [7] 李业锦,朱红. 北京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空间结构及其影响机制——以城市110警情为例[J]. 地理研究, 2013, 32(5): 870-880. [Li Yejin, Zhu Hong.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social and public security: An urban security spatial analysis based on from city crime alarm dat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3, 32(5): 870-880.]
- [8] Bennett R R, Wiegand R B. Observations on crime reporting in a developing-nation[J]. *Criminology*, 1994, 32(1): 135-148.
- [9] 郑文升,卓蓉蓉,罗静,等. 基于空间句法的武汉城区“两抢一盗”犯罪分布环境[J]. 地理学报, 2016, 71(10): 1710-1720. [Zheng Wensheng, Zhuo Rongrong, Luo Jing et al. The distribution environment of robbery, snatch and theft crime based on space syntax: A case study of the central area of Wuha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10): 1710-1720.]
- [10] 孙峰华,李世泰,黄丽萍. 中外犯罪地理规律实证研究[J]. 人文地理, 2006, 21(5): 14-18. [Sun Fenghua, Li Shitai, Huang Liping. Authentic proof study on criminal geographical laws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Human Geography*, 2006, 21(5): 14-18.]
- [11] 姜超,唐焕丽,柳林. 中国犯罪地理研究述评[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4): 561-573. [Jiang Chao, Tang Huanli, Liu Lin. Review of crime geography in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4): 561-573.]
- [12] 徐冲,柳林,周素红. DP半岛街头抢劫案件的临近重复发生模式[J]. 地理研究, 2015, 34(2): 384-394. [Xu Chong, Liu Lin, Zhou Suhong. Patterns of near-repeat street robbery in DP peninsul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2): 384-394.]
- [13] 徐冲,柳林,周素红. 基于临近相似性考虑的犯罪热点密度图预测准确性比较——以DP半岛街头抢劫犯罪为例[J]. 地理科学, 2016, 36(1): 55-62. [Xu Chong, Liu Lin, Zhou Suhong. The comparison of predictive accuracy of crime hotspot density maps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near similarity: A case study of robberies at DP peninsul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1): 55-62.]
- [14] 徐冲,柳林,周素红,等. DP半岛街头抢劫犯罪案件热点时空模式[J]. 地理学报, 2013, 68(12): 1714-1723. [Xu Chong, Liu Lin, Zhou Suhong et al.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street robbery in DP peninsul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12): 1714-1723.]
- [15] 姬新江,房福利. “犯罪黑数”探析[J]. 公安与司法研究. 新疆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1999(1): 17-20. [Ji Xinjiang, Fang Fuli. Exploration of dark figure of crime. *Journal of Xinjiang Police College*, 1999(1): 17-20.]
- [16] 杨学锋,商小平,姜兰昱. 犯罪黑数的构成与估计方法[J]. 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2007(4): 50-53. [Yang Xuefeng, Shang Xiaoping, Jiang Lanyu. The construction of dark figure of crime and its estimation method. *Journal of Jiangxi Police Institute*, 2007(4): 50-53.]

- [17] 胡联合,胡鞍钢. 对转型期中国犯罪实际发案情况的估测[J]. 社会科学,2006(1): 126-131. [Hu Lianhe, Hu Angang. Estimation of actual exposed cases in transitional period in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06(1): 126-131.]
- [18] 王大为. 中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受害问题的比较研究——对联合国犯罪受害调查的思考[J]. 公安大学学报,1997(1): 77-86. [Wang Dawei.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victimization of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Reflections on the United Nations crime victims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1997(1):77-86]
- [19] Gove W R, Hughes M, Geerken M. Are uniform crime reports a valid indicator of the index crimes? An affirmative answer with minor qualifications[J]. Criminology, 1985, 23(3): 451-502.
- [20] Zhang L, Messner S F, Liu J H. An exploration of the determinants of reporting crime to the police in the city of Tianjin, China[J]. Criminology, 2007, 45(4): 959-984.
- [21] Conaway M R, Lohr S L.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reporting violent crimes to the police[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1994, 10(1): 23-39.
- [22] Bosick S J, Rennison C M, Gover A R et al. Reporting violence to the police: Predictors through the life course[J].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2012, 40(6): 441-451.
- [23] Goudriaan H, Lynch J P, Nieuwebeerta P. Reporting to the police in Western nation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social context[J]. Justice Quarterly, 2004, 21(4): 933-969.
- [24] Levitt S 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me reporting and police: Implications for the use of uniform crime reports[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1998, 14(1): 61-81.
- [25] Tarling R, Morris K. Reporting crime to the police[J].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10, 50(3): 474-490.
- [26] Schnebly S M.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ty-oriented policing on crime-reporting behavior[J]. Justice Quarterly, 2008, 25(2): 223-251.
- [27] Baumer E P, Lauritsen J L. Reporting crime to the police, 1973-2005: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long-term trends in the national crime survey (NCS) and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NCVS) [J]. Criminology, 2010, 48(1): 131-185.
- [28] 周素红, 邓丽芳. 基于T-GIS的广州市居民日常活动时空关系[J]. 地理学报, 2010, 65(12): 1454-1463. [Zhou Suhong, Deng Lifang.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residents' daily activities based on T-GIS: A case study in Guangzhou,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65(12): 1454-1463.]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 Factors of Victims' Crime Reporting Behavior of Different Victimization

Liu Lin^{1,2}, Song Guangwen^{3,4}, Xiao Luzi^{3,4}, Zhou Suhong^{3,4}, Song Guangqin^{3,4}, Long Dongping^{3,4}

(1. Center of GeoInformatics for Public Security,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China; 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Cincinnati OH45221-0131, USA;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Center of Integrat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alysi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4.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Crime data, provided by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s,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research data for crime geography. However, not all victims would report to the poli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ta and the reality of crime and the mechanism of victims reporting behavior are still not covered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general rational choice, we carried out a victim survey in Guangzhou to investigate the crime reporting behavior of theft from person, fraud, burglary and violence and their influence of crime spatial pattern revealed by police data. Results show that the occurrence rates of fraud and theft from person are relatively high but reporting rate is low, while the occurrence rates of burglary and violence are low but reporting rates are high. Logistic models reveal that loss value is the key factor in affecting crime reporting behavior for the four types of crime. The bigger value the loss is, the higher possibility to report crime to the police there will be. What's more, Hukou status would influence the theft reporting. The reporting behavior of burglary and violence would be affected by victims' personal objective attributes and subjective sense. This study has approved that the general rational choice theory is applicable to China, but some notice should be taken care of when selecting indicators. Spatial variations for reporting rate of theft from person and burglary may exist, which reminds us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crime reporting rate when using the official crime data.

Key words: crime reporting behavior; crime reporting rate; victim; theft from person; fraud; burglary; violence